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代人: 彭燕郊回忆录 / 彭燕郊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3

(彭燕郊纪念文丛)

ISBN 978-7-5360-5900-9

I. ①那… II. ①彭… III. ①彭燕郊 (1920~2008)
— 回忆录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261 号

责任编辑: 曹玛丽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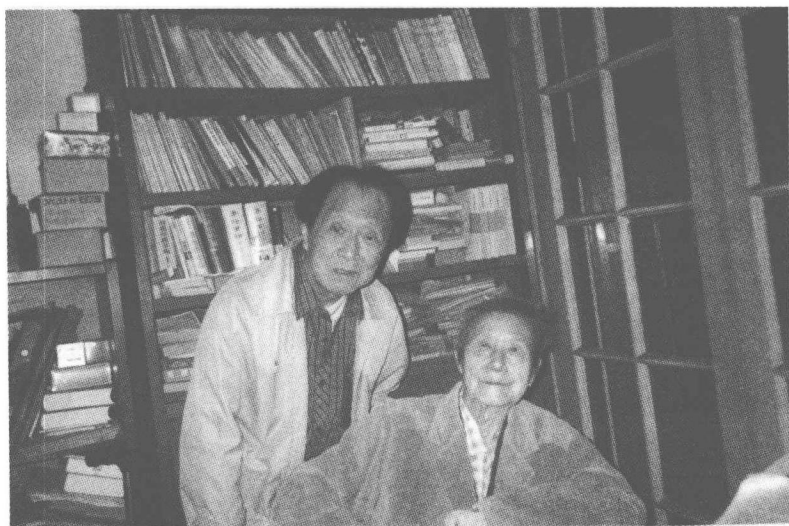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左起：黎丁 彭燕郊 庄嘉怡 周颖 骆宾基 石联星 姜庆湘，
1983 年于北京

彭燕郊和施蛰存，2002 年于上海



回憶胡鳳先生

凡是经过30年代后半期、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那一段日子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芦沟桥事变那长达十年的愤懑和反抗侵略的正义激愤被压抑的密云期，以及七·七事变引发的全面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如同冲破地层的地下岩浆突然喷发般的民族精神的勃发^明的昂扬。我对胡风兄兄的回忆，是知道了充满激情的~~那个~~^{那个}时代分不开的。

抗戰前夕，我在閩南的一戶初等師範學校
就讀。從小愛好文藝，為此課余時間全部用來
讀文學書報和學習寫作上。胡風先生曾治書，
收他“反封建論”並紅紅五元才准。
“北平時”還到市立
志“反學”也加“新
青團”漢軍“大疆河”
先期到貴溪的。后
因到印務局



《回忆胡风先生》手稿

青蓮部

目 录

001 / 自序

第一辑

003 / 亚老与诗

006 / 儒家独行侠

010 / 戏剧是他的生活的全部

020 / 历史的断层还是人生的断层

028 / 傲骨原来本赤心

036 / 忆胡风

063 / 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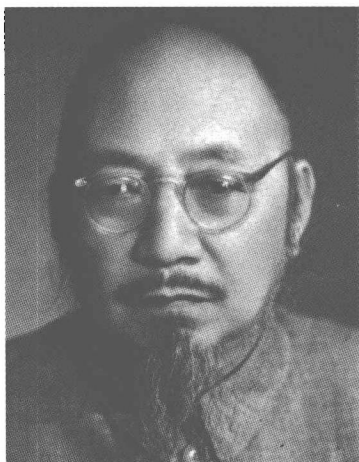
073 / 千古文章未尽才

088 / 流囚九千里

104 /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111 / 记黎烈文先生

第一辑



柳亚子

气不扬”，写五言古诗《放歌》，凌厉昂扬，让读到的人惊叹，叫他“狂生”，他一生都这么狂，狂得很正常。狂在他那就是叛逆性，因此很自然，他敬佩鲁迅先生，1933年，他写了一首《赠鲁迅》，请郁达夫帮他送去，赞美先生：“高举叛帜即千秋”，认为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革命诗人的他，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诗歌的发展历程，把握诗歌发展规律，诗的现状和未来是他最爱谈论的话题，他相信，新必能代替旧，作于1941年的长歌古体诗写道：“政治问题岂异文学问题，亦应后起前者僵”，“播新除旧我非狂”，每次谈诗，他都要强调新诗必能代替旧诗，这成为他最喜欢的话题。

他亲身经历两世纪之交中国诗歌演变过程。

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批旧体诗人里，他最敬佩的当然是谭嗣同、魏源等这些革命诗人，他们和他有共同语言，谭嗣同的“天发杀机，龙蛇起际，犹不自怨，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莽苍苍斋诗自叙）和他的“至竟何关家国事，羞教人说是诗人”完全一样。

作于1914年的《论诗六绝句》，对于清末那些保守派诗人，有非常精辟的评论：“郑（孝胥）陈（三立）枯寂无生趣，樊（增祥）淫哇乱正声”，王闿运“古色斑斓真意少”。这些评语，

在花桥东边的东灵街租一间民房住着，每天到桥头的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饭馆吃饭，住在六合路的梁先生也常到那里吃饭，不知怎的，店主知道梁先生是“大人物”，居然买了一张红纸，请梁先生给写了店名“广东”两个大字，而且还落了下款，贴在一木板上，挂到只能摆放三张桌子的夫妻小店的正当中，店主还十分得意地向我夸耀，这可真是只有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才有的景观了。



梁漱溟

梁先生是茹素的，只吃一碗蛋炒饭，加上一碗有几片青菜叶子的广东式清汤。

我只是在集会上见过他，他还记得我，我是晚辈的晚辈了，吃完饭，我觉得不能就这么走开，就陪他走过七星岩前的棲霞寺（那时是广西省立医学院），在建干路口处转弯，再向六合路走去，一边走，一边向他请教我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他用那智慧的大眼睛从眼镜片后面认真地、慈祥地望着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非常诚挚地回答我的提问。他的外貌使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个瘦小清瘦的躯体里怎么能贮存并滋生着那么多学问和思想，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时，我觉得那似乎是他的灵魂在发出质问：你们怎么把我安放到这样的躯体里？！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名时少掉了“政团”二字），我读过他发表在《文化杂志》上的《香港脱险后寄宽恕两儿》，对他的学术思想却不想提什么问题，那太复杂了，我想问问他一些

更迫切的问题，想从事西方的议会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以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如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没有人民的武装不但不能胜利，甚至无法打下去。

“军队应该国家化”这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说，国家，不就指政府吗？现在是蒋家天下，军队国家化，不等于把所有的武装力量都交给蒋吗？

梁先生举出了像广西以及云南、山西、四川地方势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妨碍着国家的统一，然而，我分辨道，这些地方势力，多多少少都表现得比蒋好一些。

“军阀，是国家的大祸”。蒋介石难道不是最大的军阀吗？那时候，年轻的我对梁先生的悲天悯人是有很大保留的。

一次，我和他谈到新诗，他知道我是写诗的：“新诗，我看过胡适的新诗，也可以的”。我拿来一首小诗《近郊建筑》请他看，他只是说：“新诗好像还是在尝试时期吧”。

在小饭馆里吃蛋炒饭的日子没有持续好久，他和比他小6岁的桂林中学的一位陈老师结婚了，当然啰，陈老师在生活上给了他周到的照顾，梁先生说，这场婚事，他是“不设防的城市被攻入”了，不只是风趣，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撤退到桂林的旅港民主人士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桂林成为蒋的心腹之患，据说，蒋曾为此而气愤得骂娘，特务开始抓人，著名的活动家萨空了突然失踪了。对于仍然以忠厚长者的风度来推动议会政治斗争的梁先生，这应该是一次凄厉的警报。

1949年，日寇要打通大陆走廊，为了保存实力，蒋的大本营早就决定放弃，自河南至贵州这条漫长战线上的抗拒，桂林沦陷了。梁先生和一部分文化人逃难到桂东的八步，抗战胜利后到了重庆。

旧政协后，梁先生在重庆办勉红学院（从这一时期起他似乎已经脱离政治活动），国共两方面都不喜欢他的主张。

1949年政协前夕，他被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不久我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其中之一是：他去见毛泽东主席时，提了两点疑问，其一是，这次他从四川来，一路上看到很多人还穿着破衣服，其二是，他看到很多新印的钞票。

即使从最好的解释来说，如果相信梁先生确实如此单纯、天真，甚至不免迂腐——他的这种疑问，不就等于是说：既然是共产主义怎么能让有些人穿得好，有些人却穿破衣服？既然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还有钞票？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懂政治，如果加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反对内战，不同意民盟，不参加蒋的“国大”以至于退出他曾是主要发起人的民盟，都可以更干脆地判定他是个不懂政治的人物。

然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学术观点却是不可动摇的，他的“村治派”事实上最后也并未形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政治人物，他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的乡村建政运动缺乏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而他却还要讲些不讨人喜欢的话，从被指斥的“伪君子”还加码为“伪君子真小人”。

万幸，他虽然经过1955年那场后来看来已不那么激动人心的批判运动，逃过“文革”这场劫难，我们因此还有这样一位“最后的一个儒家”。早年的社会，政治实践，直到成为民盟早期的重要人物，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献身救世事业的圣徒的信念。是历史选择了人呢，还是人自己选择了历史？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得到多少解答呢！

成立分为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电影五个部的“南国社”，成为戏剧运动的中心。早期的创造社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但不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另一侧面，是强调个性解放的另一表现形态。因而到1925年就明确地站到革命文学的立场上来，声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说话的文艺”。田先生发表了长达十万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当选为主席并担任党组书记。1935年救亡运动高潮中写的剧本《回春之曲》，首演由金焰、王人美任主角，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各地竞相演出，形成一股救亡戏剧运动的热潮。1934年写的《扬子江暴风雨》，是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电影方面，1933年，和夏衍（化名黄子布）一起参加“艺华影业公司”，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家倾向进步的电影制片厂，这以后相继有联华、电通。老牌的明星电影制片厂受了影响，也拍了些进步影片。从艺华的“黄金时代”起，田先生连续写出一系列电影剧本、影片插曲歌词，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电通出品的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是明星出品的影片《十字街头》插曲，应该说他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人。音乐方面，上世纪30年代中叶救亡歌曲的热潮，源头可以说是他为影片《桃李劫》的插曲写的歌词《毕业歌》，和为影片《风云儿女》等的插曲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救亡歌曲成为当时全民救亡运动的精神武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抗日热情，同时，田先生也以他的品格、学养和组织能力培育了聂耳、任光、张曙等进步音乐家。这时候，在戏剧、电影、音乐这些领域，左翼事实上已占绝对优势。1935年初，田先生着手主编《舞台与银幕》杂志，出版前在拥有众多读者的《现代》杂

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愿做主人去拼死在沙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青年进行曲》的“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我们没有退后只有向前，向前！”那一代的年轻人，是唱着这些歌走的一二·九运动走向抗日战争战场，奔向延安的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是在这样歌声的伴奏下跨着大步前进，再前进的！田先生写的是大众的心声。

他写的歌词又总是那样美，那不是一般的歌词，是诗，确实是他用歌词形式写诗。《回春之曲》里的三支插曲《春回来了》、《告别南洋》、《梅娘曲》，都那样的美，唱它就像在吟诵诗。《天涯歌女》、《四季歌》更是地道的诗，应该是他的文学成就的鲜亮标志。

1941年秋天，田先生第四次来到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一直住到1944年桂林大疏散。当时，刚刚筹建的新中国剧社渴望得到他的支持，剧社的发起人杜宣特地到湖南把他请来。皖南事变后，桂系军阀慑于蒋介石的压力，胡愈之、夏衍、范长江都被“礼送”出境，国际新闻社被查封，《救亡日报》被迫停刊，进步文化运动处于低潮期。田先生一到桂林，就和欧阳予倩、熊佛西一同发起“文化界团乐会”，请柬是他拟的：“自洞庭生波，漓江减其澄碧，而长沙再捷，明月增其清辉，自然与人世之伤感，盖亲切如此。今者鼓鼙渐远，江山如画，士女欢腾，花月争媚。但一念江南今日泰山磐石之安者，皆前方将士浴血抗战之赐，佳节未容空过，丰功尤待心酬，同志等因定9月6日晚8

候，总看到他和一些人在一起，很少看到他一个人独自走在路上。而他的口头禅是“总会有办法的”。

我觉得，有些人拿给这世界的大约是他的丰富积累的一小部分，有些人拿出来的大约往往连一小部分也说不上，田先生拿出来总是他的积累的全部，他不会“留一手”，连欢乐他也愿意和大家共享，这就是“爱热闹”吧。

一连三次，他主持三个祝寿活动。第一次是郭沫若五十大寿。第二次是为远在重庆的沈钧儒先生祝寿，第三次是为李济深将军祝寿。学杂志编辑了一个祝寿特辑，田先生写了一首新诗《南山之什》，还为余所亚画的郭沫若像题了一首七绝：“洞庭木落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若与吕尹同际遇，何缘憔悴作诗人”，深刻地通过郭沫若的境遇抨击排斥异己，假团结，真分裂，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不是把祝寿当作一场庸俗的应酬，而是当做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认真对待。

还有一次是为在重庆的民主斗士沈钧儒先生祝寿，在他主持下，文化界朋友联名向衡老祝贺，致敬。得知衡老爱搜集奇石，还特地送去桂东产的珍品。

为李济深将军祝寿，同样由田先生带头、文化界人士近百人送去亲笔签名的贺信。田先生还带领十来位新中国剧社演员参加寿宴，在座的粤、湘、桂三个战区司令长官召集余汉谋、薛岳、张发奎，以及桂系政要，这一次总算亲眼目睹文化界人士对李济深将军多么崇敬，李将军和文化界关系多么亲近。

可以有两种文艺家，一种是不愿意从事除文艺创作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的文艺家，一种是既从事文艺创作又能从事创作以外的活动的文艺家，田先生属于后面这一种。

田先生和李济深将军的关系，从下面这些事可以看出他们之

间政治上有至少是相近的观点。文化界人士都用李任公称呼李将军（李将军号任潮）。一次，田先生在李将军那里，当着好些人抗议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谈到音乐家任光惨死，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李将军以沉默表示赞同。新中国剧社作为民间剧团，全靠演出的票房收入维持，演出是有周期性的，新剧目上演要经过排戏，制作服装道具，联系剧场这些少不了的阶段，还要筹措演出资金，间歇期甚至多到两三个月。没有收入，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一次，田先生跟李将军提到这件事，他就拨了一批军粮给新中国剧社，缓解了无米下锅的燃眉之急。

1944年夏，日寇发动打通大陆走廊战役，从河南打到湖南，直迫广西，桂林开始疏散。蒋的大本营已决定放弃桂林，人心惶惶，田先生挺身而出，组织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发动了大规模“国旗的献金大邀行”，得到李将军的全力支持，亲自和桂林老绅士龙积之、封祝祁、李任仁等组成“长老团”一起登上大卡车，缓缓通过桂林主要街道，接受沿途商店和涌进游行队伍的群众踊跃捐款，这种和广大人民同心协力的作风，早已大招蒋



安娥、田汉夫妇

介石之忌，不久，蒋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办公厅”建制，把他调去重庆担任什么“军事参议院院长”，企图彻底把他

架空，当然受到他的拒绝。

还有一位和田先生比较接近的将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北伐时期，他是与叶挺齐名的“铁军”（第四军）将领，抗日战争初期以指挥淞沪抗战得盛名。田先生曾和文化界人士一起到六场战地慰劳并赋诗赠张：“把酒持螯咤战云，一时饮者尽输君，浦江两月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离桂林近，田先生和他时有接触，有时他也能做些支持进步文化界的事。桂林大疏散前，新中国剧社的创始人之一，广西文化界人士李文钊生活困难，田先生请张设法安置，张任命李文钊为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少将副处长。李担任过广西的国防艺术社社长，后期是副社长（社长程思远），筹建新中国剧社时，李变卖祖遗房产（桂林环湖榕树楼旁有两座楼房的大宅院）做开办经费。文化界朋友都说，这件事充分表现了田先生的重情谊、热心肠。

在文艺界，田先生广泛的社会联系是谁都比不上的，不但因为他的声望，他的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也因为他是公认的戏剧运动领导人物。话剧界、电影界、戏曲界、新闻界各种各样人为各种各样的事和他交往，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戏曲界有一种人，类似经纪人，组织戏班，从演出中取利，日子久了，也懂得编剧，编些连台戏。那时桂林就有这种人。田先生说：这种人也不少，这种社会当然会产生这种人，只要还没有成为“戏霸”，就有必要和他们来往，争取他们做好事，往好的方面走。话剧的、戏曲的、电影的演员中间，少不了有些染上恶习的，田先生从不歧视他们，总是想办法帮助他们上进。

太平洋战争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一些文化人来到桂林，其中有一个战前发行量最大、很有影响的电影杂志《电声》的

主持人张永独想在桂林办个娱乐性小报，找到田先生，要求给予支持，这个人和田先生早先有些接触，很有活动能力，但不属于进步文化界。田先生告诉我，这种人以前在上海是很多的，靠贩卖影剧圈的马路新闻过日子，有时不免制造些所谓的桃色新闻骗钱，对付他们的办法还是引导他们走正路。

阳翰笙在《痛悼田汉同志》（《人民日报》1979.4.26）里写道，周恩来生前曾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评价是很准确的。田先生不是那种书斋里的文人，他的工作范围从书斋扩展到书斋以外，他不单单只写作，还有惊人的社会活动能力。

历史的断层还是人生的断层

——记艾青

—

最初读到艾青的诗，是在左联主办的丁玲主编的杂志《北斗》上，用的是莪伽这个笔名。第一次见到用艾青署名的诗是发表在一个叫《出版消息》的小刊物上的，那个刊物类似今天的读书类刊物，也是左翼作家办的，发表诗好像只这一次，印象较深。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是在一种叫做《汉文正楷活页文选》上读到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活页文选风行一时，很多书店都出活页文选，很多学校用作补充教材。那时还没有楷体铅字，最初制造楷体铅字的记得是个陕西人，王独清的同乡，为了推广楷体铅字，请王独清编活页文选。王独清自然知道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选了艾青的这首诗，当时还